

北京市法學會中國法律文化研究

法

首页

关于我们

学会活动

会员关注

学界动态

民族法文化

法史春秋

名作佳文



首页 >> 名作佳文 >> 佳作一览

辛亥革命与梁启超单一制国家结构思想的形成（二）

2011-08-04 访问量: 访问量: 552

五、同异之辨：“反联邦党人”梁启超与美国的反联邦党人

由于辛亥期间的梁启超认同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，拒斥联邦制国家结构形式，梁启超贴上了一个尚不为人所注意的标签：反联邦党人。这个特殊的身份——建构时期的“反联邦党人”的身份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美国建国时期的反联邦党人。在建立现代国家的节骨眼上，都涌现出了自己的“反联邦党人”，这种历史的巧合，值得解读的思想信息。让我们试着比较这两种“反联邦党人”之同与异，以之作

从相同的方面来看，第一，他们都是在现代国家的建构过程中应运而生的，他们都提出了自己的“立国大方针”，都为本国贡献了颇有思想份量的建国文献，梁启超为我们留下的建国文献，可见于，但远远不止于，本文引用的论著。留下的建国文献，则可见于1981年出版的七卷本《反联邦党人文集》。[37]第二，他们都有一个最大公约数，那就是“反联邦”。梁启超反对联邦制的国家结构；美国的汉密尔顿等人所主张的联邦制。第三，大致说来，他们都倾向于保守主义。美国反联邦党人是现状的维护者。他们慨叹宪法偏离“古制”，偏离“共和国古老而坚定的习惯”表达了保守派的最根本的观点：旧就是好。另一些人则表达了对美国宪法完全赖以的深深遗憾。”[38]在清末民初，在“革命派/改良派”的二分法中，梁启超代表，相对于革命派来说，其保守倾向也是极其明显的。第四，正如前文已经提到的，他们都是建构时期的失败者。美国的反联邦党人“作为反对者，也是失败者，他们在1787年宪法制定下，只能局促一隅。他们被刻画成是思想狭隘的地方政客，不愿正视邦联的种种弊端，成为目光短浅之辈，眼界不过其所在州县。”[39]同样，如前所述，政治实践中的失败者。

但是，他们之间的差异更值得注意。对此，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。

一方面，虽然他们都是“反联邦党人”，都反对联邦制，但是，他们的方向不同。梁启超反对联邦制，是希望走向单一制，希望凭借单一制国家结构，进一步强化中央权力对于全国的有效支配。美国的反联邦党人虽然也反对联邦制，但他们的目标是继续维持一个松散的邦联架构，让公共权力的重心继续保留在各州，而不是相对集中的中央政权机构。可见，在中美两国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关键时刻，在联邦制国家建构的关键时刻，“反联邦党人”梁启超反对联邦制，其目标是建立起比联邦制更集权的单一制国家结构；美国的反联邦党人反对联邦制，其目标是维持比联邦制更松散的邦联制。

另一方面，在他们各自不同的改制诉求背后，是两种不同的法哲学。对此

授塔科夫写道：“应该致力于在国内获得并且维持可能的最好制度，然后才去冒险、捍卫这种国内制度；还是必须从一开始就聚焦于外来危险，并选择最善于自我保存的那种内部社会？这一问题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古代‘理想主义’后继者的‘现实主义’区别开来，前者关注最好的社会，而后者关注防御的必需。这一问题也是区别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的决定性因素。”[40]如果以这样的两分法来区分联邦党人与梁启超，那么，可以发现：美国的反联邦党人希望在国内维持一种“最好制度”，他们是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的“理想主义”的继承人。至于“反联邦党人”，他们从一开始就聚焦于外来危险，并选择最善于抵御外部威胁、实现自我保存的那种“最好制度”。按照这样的两分法，梁启超既可以归属于马基雅维里开启的思想谱系，当然也可以归属于古代法家开启的思想谱系，因为这两种思想谱系都可以分享“现实主义”这个名称。

注释：

[1] “新中国建设问题”、“中国立国大方针”是梁启超分别在1911年11月发表的有关单一制国家结构思想的代表性论著，详见下文的分析。

[2] 丁文江、赵丰田编：《梁启超年谱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。

[3] 在“中国知网”上搜索，相关的专题论文只有一篇，孙继才：“论辛亥革命家结构观”，《广东社会科学》2009年第3期。

[4] 李泽厚：《中国近代思想史论》，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5月版。

[5] 美国学者Robert Darnton所言，转引自，罗志田：《近代中国史学十论》，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8月版，第204页。

[6] 譬如，[美]斯托林：《反联邦党人赞成什么——宪法反对者的政治思想》，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4月版。

[7] 详见，张朋园：《梁启超与民国政治》，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10月版。

[8] 详见，汪太贤：《从治民到民治：清末地方自治思潮的萌生与变迁》，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1月版，第124-125页。

[9] 葛兆光说：“一贯自信的中国人突然发现近在咫尺的东邻，……在1895年与日本签订的清帝国签下了城下之盟，……这才引起了对整个文明的信心的崩溃。”（《葛兆光自选集》第二卷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版，第334页）因此，可以把1895年称为“乾坤颠倒之年”。

[10] 丁文江、赵丰田编：《梁启超年谱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。

[11] 梁启超：“戊戌政变记”，载梁启超：《梁启超全集》，北京出版社1999年7月版，第979页。

[12] 梁启超：“商会议”，载梁启超：《梁启超全集》，北京出版社1999年7月版，第979页。

[13] 梁启超：“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”，载梁启超：《梁启超全集》，北京出版社1999年7月版，第430页。

[14] 梁启超：“答某君问德国日本裁抑民权事”，载梁启超：《梁启超全集》，北京出版社1999年7月版，第979页。

[15] 梁启超：“教育政策私议”，载梁启超：《梁启超全集》，北京出版社1999年7月版，第758页。

[16] 梁启超：“新民说”，载梁启超：《梁启超全集》，北京出版社1999年7月版，第758页。

[17] 梁启超：“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”，载梁启超：《梁启超全集》，北京出版社1999年7月版，第1071-1073页。

[18] 详见，梁启超：“上摄政王书”，载李华兴、吴嘉勋编：《梁启超选集》，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11月版，第554页。

[19] 以上三段文字中的引文，均出自，梁启超：“新中国建设问题”，载梁启超：《梁启超全集》，北京出版社1999年7月版，第2433-2435页。

[20] 梁启超：“中国立国大方针”，载梁启超：《梁启超全集》，北京出版
2495页。

[21] 梁启超：“新中国建设问题”，载梁启超：《梁启超全集》，北京出版
2434页。

[22] 梁启超：“致徐勤书”，载李华兴、吴嘉勋编：《梁启超选集》，上海
11月版，第601页。

[23] 梁启超：“新中国建设问题”，载梁启超：《梁启超全集》，北京出版
2435-2436页。

[24] [日]狭间直树：“《新民说》略论”，载狭间直树编：《梁启超·明治
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》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3月版

[25] 梁启超：“中国立国大方针”，载梁启超：《梁启超全集》，北京出版
2489页。

[26] [美]张灏：《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（1890-1907）》，崔志海、葛
版社1997年1月版，第169页。

[27] 黄遵宪：《日本国志》（上卷），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版，第94

[28] 梁启超：“少年中国说”，载梁启超：《梁启超全集》，北京出版社1
页。

[29] 《日知录》，卷十三，“正始”。

[30] 梁漱溟：《中国文化要义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版，第143页。

[31] 梁启超：“中国立国大方针”，载梁启超：《梁启超全集》，北京出版
2488页。

[32] 梁启超：“进步党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”，载梁启超：《梁启超全集》
年7月版，第2615页。

[33] 详见，程燎原：“晚清‘新法家’的‘新法治主义’”，《中国法学》
中：“显隐之间：百年中国的新法家思潮”，《华东政法大学学报》2011年第1

[34] 梁启超：“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”，载梁启超：《梁启超全集》，北
版，第1269-1280页。

[35] 梁启超：“管子传”，载梁启超：《梁启超全集》，北京出版社1999

[36] 梁启超：“管子传”，载梁启超：《梁启超全集》，北京出版社1999

[37] 此七卷本文集由芝加哥大学教授斯托林及其学生德雷共同编辑。详见，
联邦党人赞成什么——宪法反对者的政治思想》，汪庆华译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
者前言”，第2页。

[38] [美]斯托林：《反联邦党人赞成什么——宪法反对者的政治思想》，
出版社2006年月4月版，第9页。

[39] [美]斯托林：《反联邦党人赞成什么——宪法反对者的政治思想》，
出版社2006年月4月版，第2页。

[40] [美]塔科夫：“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论对外事务”，苏婉儿译，载
（第二辑），商务印书馆2008年1月版，第120页。

上一页

文章转引自《中国法学》2011年第4期

（编辑：张洁）

